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马来西亚数理英化政策(2003-2011) 的语言政治解析

Teaching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in English in
Malaysian Schools (2003-2011): A Policy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Politics

王国璋
(ONG Kok Chung)

摘要

马来西亚自1970年代确立独尊马来语的语文政策后,教育体制内的教学语即以马来语为主。惟2002年时任首相的马哈迪却在未获社会普遍共识下,倡议将大专至中、小学校的数理科目都转为英语教学,并自2003年起就在全国家仓促执行。不过该政策推行期间争议不断,民间教育团体也多有抗议、顽拒者。2009年政府终决定自2012年起,逐步恢复政策前的原状。本文即试图梳理数理英化政策背后的语言政治运作,并以Bernard Spolsky对“语言政策”的广义界定,作为解析本案的基本框架。分析的重点不在于评估其教育成效,而是探讨该政策为何发动得如此仓促?争议何在?政治角力如何运作?又为何以失败告终?

马来西亚当前的国家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和社会上的语言实践之间,显然都存在落差,张力难免。这种不一致也逼使执政菁英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调整官方思维,数理英化政策正是这方面的一项重大变革。惟政策受挫,说

明的恐怕不是民间社会拒绝调整,而是政策本身并不得法,各族群间及族群内部也远未就此达成共识。然而结构性的落差既然犹在,该政策落幕后国家的其他迂回调整方案,应仍会一再涌现。

关键词: 马来西亚教育、语言政策、语言政治、数理英化政策

Abstract

Malay language has long been the main medium of instruction in the Malaysian education system since the 1970s. However, its supremacy over other local languages was challenged in 2002 when the the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Mohamad proposed to adopt English as the teaching medium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in all levels of education. The policy (*Pengajaran dan Pembelajaran Sains dan Matematik dalam Bahasa Inggeris*, PPSMI) was hastily implemented in 2003 amid controversy, yet in 2009, the government decided to phase it out from 2012 onwards.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language politics concerned with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based on Bernard Spolsky's definition of 'language policy'. The focus is on political debates and interactions behind the scenes rather than the pedagogical effectiveness of PPSMI.

Tensions arise as discrepancies among the state language ideology,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societal language practices in Malaysia persist. PPSMI might reflect efforts of the ruling elites in re-defining state language ideology; its failure nevertheless implies an erroneous approach of implementation as well as the lack of consensus both within and among the major ethnic groups. As long as the structural discrepancies persist,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state may keep resorting to other re-adjustment attempt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crisis'.

Keywords: Malaysian education,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olitics, PPSMI

马来西亚自1970年在语文政策上改弦易辙、独尊马来语后,教育体制内的教学语即以马来语为主。惟2002年5月,时任首相的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却在未获社会普遍共识下,倡议将数理科目的教学语文转为英语,并自翌年起未经试办,就在全全国仓促执行。于是自2003年始,不仅公立大专院校的数理科系转用英语教学,更重要的是全国中、小学校的数理科,也开始逐年逐级转换为英语教学。不过该政策推行期间争议不断,民间教育团体也多有抗议、顽拒者。2009年7月8日,新首相纳吉(Najib Razak)的内阁终决定自2012年始废止数理英化政策,并再度以逐年逐级

过渡的方式,恢复政策前的数理科教学用语。

本文试图梳理数理英化政策背后的语言政治运作,并以Bernard Spolsky (2004)对“语言政策”的广义界定,作为解析本案的基本框架。分析的重点不在于评估其教育成效,而是探讨该政策为何发动得如此仓促?争议何在?政治角力如何运作?又为何以失败告终?研究资料方面,则除了就相关文献作文本分析外,主要是基于笔者于2005年7月至2007年11月间,在马来西亚与各界进行的深度访谈和对某些学校的实地观课、观察。深度访谈前后共42场,受访者总数则为46人。这当中有10人为各党从政者(4人为执政集团国民阵线成员,在野阵营方面则人民公正党2人,民主行动党2人,伊斯兰党1人,社会主义党1人);16人为相关民间组织的领导人;17人为位居前线的公立及私立教育工作者;另有3人则是曾积极参与过政策论辩的意见领袖与新闻从业员。又,受访的前线教育工作者涵盖东、西马两地,服务的学校则是分别位处檳城、吉隆坡直辖区、雪兰莪、森美兰、彭亨、柔佛及沙巴各州。此外必须交代的是,数理英化政策虽涉及马来西亚各语文源流的中、小学校,但以华人社会的反应最为分歧、激烈,政策在华人小学(下称“华小”)落实的细节也最为复杂与政治化。本文遂将偏重于讨论马华社会及华小和这项政策之间的互动。

一、数理英化政策的酝酿背景

1957年马来(西)亚自英殖民者手中独立后,英语曾持续在国家的行政、法律、商务与教育诸领域扮演重要角色。1967年的《国语法》(National Language Act)虽确立了马来语作为唯一国语及官方语文的崇高地位,英语的辅助性官方语文角色不再,但英语在各方面的使用实际上未遭压抑。

就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而论,马来西亚教育体系因其特殊的殖民历史因缘,本就颇为复杂。1960年代国内仍存在四个体制内的小学系统及两个体制内的中学系统。小学方面,家长可自由选择送孩子入马来语教学的“国民学校”(Sekolah Kebangsaan),或以英语、华语、淡米尔语教学的“国

民型学校”（*Sekolah Jenis Kebangsaan*），亦即政府仅提供部份资助的学校。中学方面，体制内则唯有马来语学校或英校可供选择。又，华社早年也曾自资建立不少华文中学，惟自《1961年教育法》颁布后，这些华文中学大多已在政府取消津贴的威胁下，转制为英文中学，徒留一科华文。不过即便如此，当时仍有16间华文中学不愿屈从政府的条件，宁自立为独立中学（下称“独中”），教学语仍以华语为主，却无法再获得政府的分文资助。

惟1969年的五一三族群流血冲突爆发后，激进马来民族主义抬头，马来西亚遂自1970年代始，经历过一段长约廿年的独尊马来语言、文化，并由国阵政权透过“新经济政策”等手段积极扶助马来族群的时期。当时教育上影响深远的一项变革，就是政府自1970年开始，逐年逐级，将既有的英校中、小学，全面转换为马来语教学。换言之，十数年内，马来西亚教育部就彻底清除了英校教育系统。此外，1970年，第一所宣称全面以马来语教学的大专——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就已成立，而1983年后，各大专院校基本上也都完成了教学语的转换，即便数理科系也无法幸免。

1980年代以降，国民教育体制内的小学系统仍有三个，即以马来语教学的国民小学和分别以华语、淡米尔语教学的国民型小学。中学方面，撇开华文独中不论，体制内就只剩下一个基本上以马来语授课的国民中学系统了。¹ 换句话说，体制内的华文教育系统目前只及于小学阶段，而这也是马华主流社会为保文化遗产，一贯对任何波及华小的政策改动都颇为敏感的重要原因，即视华小的存续为重要的文化底线，不容再失。惟值得一提的是，英校消逝前，华小曾渐受强势的英小威胁，以致华校生总数虽仍多于英校生，当时的入学趋势却是英校生稳定成长，华校生比例则逐渐萎缩。英校消逝后，不少华裔家长，包括英文教育出身者，如今面对华小与国小这唯二选项（淡小则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往往宁选择华小，马华适龄学童入读华小的比例复升，目前大致总能维持在九成左右的稳定局面。² 反观国小，据《马来西亚教育蓝图（2013~2025）》（*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 2013-2025*）资料所示，2011年其学生群体中94%为土著，3%为印裔，华裔学子则只占区区1%。同理，1960年代那16家拒绝改

制而宁为独立中学的华校,虽一度沦为超龄生及会考落第生的收容所,苟延残喘、几不得保,1970年代后却也得益于英校殒落及马华社会因屡受打压而衍生的反弹心态,经历独中复兴运动后,逐渐复兴至当前60家的规模。³

英校殒落固然大有利于马来语真正确立为国语及唯一官方语的地位,后遗症却也很快浮现。敏感且仍由英语菁英主导的商界首先就发现,中学及大学毕业生的英文水平,此后即大幅滑落,就业者与就业市场的要求出现落差,以致商界雇主在1990年代政府调整政策、开放设立英语教学的私立大专后,多倾向雇用本地私校及海外留学归来的大专毕业生,造成公立大专生严重的失业问题。⁴与此同时,大批领着国家的优渥奖学金赴英、美、加、澳等英语系国家留学的马来学生,⁵若与其英语教育出身的前辈相较,则多表现不佳,甚至无法完成学业。其次,即便是执政者本身,如马哈迪,都开始意识到其管治、行政团队的英文素质滑落,而这当然不利于官员在国内外的工作效能与国际参与。⁶更重要的一点还是1980年代后经济局面的转变。电脑、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及国际上当道之新自由主义思潮,急速推动着全球资讯、经贸的整合步伐,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来临前更恰逢国内经济欣欣向荣,⁷不仅外来投资热络、制造业兴旺、资讯产业起飞,雄心万丈的马哈迪更于1991年高倡“2020宏愿”(Vision 2020),冀以三十年的时间让马来西亚跻身已开发国家行列。高科技产业发展乃宏愿重要环节之一,“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的超大型计划即为其例。如何相应提升国民的素质与竞争力,遂成政府当务之急。

马哈迪政府的响应之道,就是首先开放箝制多年的高等教育领域,让民间大量创设私立大专院校,并允它们以英语教学。其次,他也尝试为公立大专的语言束缚解套,于1993年甘冒遭马来民族主义者抨击的风险,允许公立大专的理工与医学相关科系恢复英语教学。惟马来知识界当时对此反弹甚大,该措施后来即不了了之,遑论再往下推展至中小学阶段。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重挫马来西亚经济,翌年副首相安华(Anwar Ibrahim)遭罢黜后引发的“烈火莫熄”(Reformasi,意为“改革”)社会抗议运

动，更让马哈迪穷于应付、无暇他顾。1999年大选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下称“国阵”）保住执政权，局面逐渐稳定后，马哈迪才终得以重思语言政策之调整。数理英化政策遂在此政经与社会脉络下酝酿开展。

二、文献回顾

前已述及笔者希望探究的问题是：数理英化政策为何发动得如此仓促？争议何在？政治角力如何运作？又为何以失败告终？据此有必要回顾两方面的文献，一就是曾具体论析马来西亚语言政策与政治之变迁者，二则是笔者拟借用为本文分析框架的Bernard Spolsky相关著作。

（一）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与政治

任何政策因涉及资源的分配或重分配，牵动各方利益变化，自然难免政治争议，语言政策也不例外。数理英化政策反映的首先是英语藉全球化大潮对马来西亚构成的压力，而英语之所以如此强势，和晚近数世纪以来英帝国及美国相继崛起为世界政经霸权的地位息息相关，并非单纯的语言因素所致。强势语种和弱势语种的使用者之间，权力关系并不平衡。譬如英语为母语者在当今之世占尽优势，亦无学习第二及第三语言的强大压力；反观母语为弱势语种者，往往就需要付出不少额外资源与时间来学习第二及第三语言，以尽量弥平其竞争上的劣势。然而个人的语言学习毕竟有其局限，以马来西亚为例，英语、马来语、华语、淡米尔语（*Tamil*）等国内的主要语种皆源自不同语系，兼学的难度本来就大，除日常的社会沟通外，能真正精通双语者已属少数，遑论精通三语或四语。语言习用上的这种零和（*zero-sum*）性质，即偏重某语种之学习往往就会影响到个人对其他语种的掌握能力，遂使语言竞争里难免存在赢家和输家。

学界对马来西亚语言议题的讨论，早年主要是偏重于语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领域，或是将它纳为族群政治的其中一环来谈，而

鲜少专门处理语言的政治面向。语言规划学者Asmah Haji Omar早在1970年代时就指出,国家在将马来语制定为国语的规划上过程平顺、并无争议,但在官方语和教学媒介语的规划上则面对激烈争执。此因国语作为国民认同之象征符号,与官方语、教学媒介语作为国民的沟通及教育工具之意涵毕竟有别(1979: 14)。官方语和教学媒介语的争议重点,是马来语该不该获确立为“唯一的”官方语文?又应否确立为国民教育体制内的“主要媒介语”?后者指的即是除了各语文科及相应的文学科目外(如华文及中国文学;英文及英美文学),一律以马来语来教学。

Asmah在这方面的看法与官方无异,即认为联盟(Alliance)三党在国家独立前夕既已有过政治协议,以承认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换取非马来人的公民权,非马来人就永不该挑战马来文化和马来语的主导地位。而以马来语作为唯一的主要教学媒介语落实在一个统一的国民教育体系里,也能够达致国民团结。面对马来西亚的多语及多族群社会,Asmah对双语或多语教学是期期以为不可,并认为华人和印度人在语文议题上的纠缠,正是导致马来人和非马来人关系恶化并最终导致五一三流血冲突的因由之一,所以她乐见《1971年煽动法》对语言议题的箝制(ibid.: 11, 14, 41, 44)。⁸ 不过民族主义激情虽驱使Asmah对马来语的未来怀抱信心,另一方面她却也常在著作里流露出对马来语竞争力不如英语——即便是在国内——的忧虑。所以为确保马来语文成功,就必须压制英语。她反对以英语教授学校和大学里的理工科,因如此一来,马来语就只会用于教授艺文及社会科学等科目,学生间势将形成上下等级之分,而国语也就难脱二等语文的污名(ibid.: 55-56)。类似的观点,在1970至80年代的马来西亚学界多有支持者,这里不赘。

不过1990年代中期以降,反思英语在马来西亚语言规划中的位置的议论,又逐渐浮现。譬如另一极具影响力的语言规划学者Abdullah Hassan (2005),就触及将双语重新引入马来西亚体制内——或更准确地说,马来社群内——的可能性。Abdullah虽赞誉国家五十年来的语言规划颇为成功,并与Asmah一样认为扶持马来语作行政及教育用语的努力,不单是为了国民团结,也是土著要顽抗移民群体的优势以免遭对方压制的斗争。不

过他也对这导致马来人逐渐趋向单语发展的副作用表示忧心，尤其乡区马来人往往“连基础水平的英语”都达不到。反观华人和印度人，既掌握了双语甚至三语，也对这语言优势深有体会，致力维持。马来人必须意识到他们也该掌握双语，否则“这将再度危及国民融合的进程。面对双语社群，单语社群会大为吃亏”（ibid.: 7, 10）。就行政与教育方面的用语而言，Abdullah向往的是马来语—英语的双语观而非多语，而他看问题的视角，依然是以马来族群为本位，即英语重获重视纯是出于民族的功利需要，而无关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错误。

不过诚如Robert Phillipson所点出，语言规划界的专业意见多受西方影响并以西方世界的经验为根柢，但这在第三世界的多语情境里是否适用，其实颇有疑问（1992: 84）。相较于语言规划学者的乐观情绪，从族群政治观点研究马来西亚语言议题者，则大多对国家语言政策的成效持疑。由于族群间根深柢固的猜疑加上族群政治运作，后者倾向认为以马来语为唯一国语及官方语来达致国民团结的作法，不仅过于简化、天真，更不无反效果。Richard Mead就曾提到执政的国阵菁英之两面性：面对全国听众，常侃侃而谈如何建构共同的国家认同；惟面对各自的族群成员时，则会谈论族群间的竞争博弈。Mead的研究发现，独尊马来语之语言／教育政策，虽至1982年时已全面获得落实，却未能带来预想中的团结（1988: 39）。柯嘉逊则是举1983年由全国15个华团领导机构联名提交政府的《国家文化备忘录》为例，说明国内仍有驳斥“单语及单一文化才能团结各族人民；多语及多元文化将导致人民分裂”之论调的不同观点。此因民族或国家团结与否，“经济、社会与政治因素更为重要”（Kua 1990: 215）。

就语言政治的讨论而言，Margaret Roff (1967) 曾对围绕着1967年《国语法》制定过程中激发的政治争议有过较详尽的论析，惟与R.B. Le Page等早期关注过马来西亚案例的西方学者类似，虽有本土经验，但囿于自身的语言能力与学界网络，他们对基层华裔与印裔群众的语言关切似乎并不熟悉，亦乏同情。后者对国家语言政策的抗议，在他们眼中乃自私、激进之举，更不代表族群的主流民意。反观联盟政府的折衷取态值得肯定，成功在各方的语文要求间取得微妙妥协。Roff尤其乐观地认为，1967年的语

文争论拖到1969年大选时,或已烟消云散(1967: 328)。但她不幸错估形势,1969年5月大选后爆发的族群冲突,语文议题正是导火线之一。

相较之下,Diane K. Mauzy对非马来社群在这方面的怨念,则明显有着更深刻的理解。Mauzy曾生动描绘语言/教育政策在马来西亚由倡议至落实的一般过程如下:

语言与教育的政策倡议在马来西亚的典型推进过程是:政府会先大致地宣告政策,然后作小幅让步,并对实施的细节语焉不详。接下来,马来人和非马来人都会就此表达抗议。不过随着政策全面或局部地获得落实,非马来人会默许之并作出相应调整,与此同时则表达他们将此视为最后底线的愿望及决心。至于马来人方面,则是会不满该政策和政策的落实情况,认为政策取得的进展不足或进度缓慢。(Mauzy 1985: 164, 笔者中译)

然而非马来人对语言/教育政策展现出的弹性与调适能耐,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怨忿不满终将散去。事实上,恰是国阵政府这周而复始的决策模式破坏了华教界对它的信任,以致任何新的政策倡议,都不免让后者警惕、猜疑。不过Mauzy所观察到的1970至80年代初的情势,对峙语种主要是马来语和华语,分界线则是落在“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1990年代后情势又变,英语俨然已经成了两阵营内母语捍卫者的共敌。马来人该如何面对英语? Alastair Pennycook指出一方面,强势英语必然会对马来语的国语及官方语文地位构成威胁;另一方面,马来人若未能好好掌握英语,必将积弱不振,何况早已经掌握经济优势的非马来人多能更好地驾驭英语。此外马来语的使用以公领域为主,英语则是依然主导着非马来人所活跃的私领域。所以英语对马来人来说不纯粹是个外语或国际语言,掌握英语不仅有助其环球竞争,更是与当地华人竞逐所需(1994: 194, 199, 201)。

李福源就几大语种在族群政治下的竞逐,近年来有更细致的讨论。他认为二战前的马来亚,可以被归类为拥有多语教育体系的双语国度(bilingual state with multilingual education, 这里的双语是指马来语和英语);二战后马来亚则是踟蹰于双语和多语之间。独立初期,国内一度充

斥着激昂的语言与教育争议；1969年族群暴动后，国家则试图确立“局部双语”。而晚近的全球化大潮，则让他看到了多语意识的回归，并促成“一个有限的多语教育体系在马来西亚重现”（Lee 2007: 119, 132, 137）。不过教育实践上的多语趋势，是否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在这方面也已经相应转变？

如前所述，民间与政府在“多语教育体系”的争论上，华文教育体系的赓续与否乃最大张力所在。然而英文文献对华文教育界的论述理据与要求，多缺乏理解而失之偏颇，遑论点出马华社会在语言议题上的族群内歧异。陈绿漪的*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1997) 当是其中异数。该历史专论的焦点虽是落在1950年代，它对华社内部就语言议题之歧异看法的细致分析，或仍与今日情势相距不远。华文教育诚然是马华政治的主轴之一，因其紧扣马华当代的其他议题，几可谓支持华文教育，即等如支持屡遭国家政策侵蚀的华人权利（Tan 1997: 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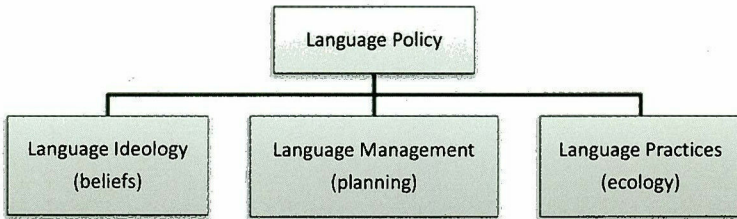
无论如何，1990年代中期后环绕着马来语和华语教学的争辩渐少，而伴随时髦之“全球化”一词而来的，是马来西亚教育界对英语新角色的探索。Saran Kaur Gill (2002) 为国内英文水平的“严重倒退”哀叹，并疾呼国人以务实态度，将攸关国家竞争力的英语视为“爱国语言”（the language of nationalism）。2002年当马哈迪正式倡议以英语教授数理科后，Gill毫不意外地予以大力支持（Gill 2005）。反观Alis Puteh面对英语风潮，则是坚定捍卫马来语的地位，反对数理英化（Alis 2006）。不过他一方面强调母语教学对马来学子的有效性，令方面却又支持将一个基本上单语（马来语）的教育体系套用在多语境的马来西亚社会，这就未免自相矛盾、难成说法。

（二）Spolsky就语言政策的分析框架

浸淫语言政策研究多年的Bernard Spolsky (2004: 8-14) 认为广义的语言政策，可大致分三个层面来看，即语言的意识形态、管理和实践（language ideology, language management & language practices），而这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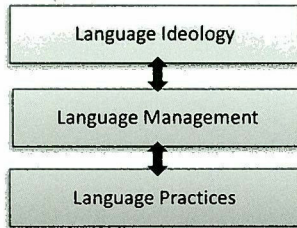
个层面彼此未必协调一致（见图一）。语言政策这三个层面的互动，既可能由上而下，也可能由下而上，彼此互相牵动（见图二）：

图一：Spolsky的语言政策分析架构



Source: Spolsky (2004: 5-15) & Shohamy (2006: 53)

图二：语言政策三层面的互动关系



首先，所谓语言的“管理”，其实就是一般学者认知中狭义的语言政策。例子如官方为提倡、扶助或打压某特定语文所制定的具体官方语文政策，或一般机构、公司内部的具体语文使用规范（如规定同事间的文字沟通必用英文，口头沟通则可使用其他语言），或小至个别家庭内家长所规定的语言使用规范（如要求孩子跟父亲以英语沟通，跟母亲则改用华语交谈）。语言管理无疑是语言政策中最显明的部份，也是语言政治运作中各方争夺之地，因规范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各方的权力与权利自然就会出现差异。就本案例的讨论而言，语言管理指的即是国家在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语言政策，主要也就是对教学语文的规范：什么学校该用 / 可用 / 不可用哪些语文教学？不同教学语之间的分工又如何？

至于语言的“意识形态”，Spolsky指的则是相关群体“认为”

(think) 应如是语言规范或规划。意识形态上觉得应该如何如何, 不必然就能顺利落实在具体的语言规划当中。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都可能构成障碍, 故语言意识形态和语言管理未必一致。譬如多语政策未必是非洲某国当权的主流族群所愿, 但为顾及政治上的可行性, 却不得不往多语的政策方向规划。同理, 国家具体的语言规范如何, 不必然就能框限住民众日常生活里的实际语言行为, 尤其是私领域的语言互动。语言的“实践”, 顾名思义, 指的就是这一层面(类似讨论亦可见Shohamy 2006: 53)。以下笔者将以2003~2011年间的数理英化政策为焦点, 藉Spolsky的这个基本框架, 来解析当中的语言政治互动。

三、数理英化政策的倡议、执行与结果

2002年5月3日, 首相马哈迪所属的巫统古邦巴素区部(Kubang Pasu UMNO division)通过决议, 呼吁政府增加学校的英文科节数, 并将某些科目转用英语教学, 冀以提升国民的英文程度。该话题随即在马来报章上引发热烈讨论, 而马哈迪本人于三天后甚至表示, 政府并不介意复办英校, 以遏阻英文程度下滑。2002年5月10日, 在主持过巫统最高理事会(Supreme Council)会议后, 马哈迪终于宣布自翌年起, 不仅要將公立大专院校的数理科目转用英语教学, 就连全国中、小学校的数理科, 也要开始逐年逐级转换为英文教学(*New Straits Times*, 11 May 2002: 1)。然而恢复英校之构想, 因对马来民族主义情感的冲击过大, 则未过得了巫统最高理事会这一关。数理英化政策遂可视为马哈迪试探过马来社会民意后的一个折衷方案, 即老练如马哈迪, 或已预见到恢复英校在现阶段仍不可行, 乃诉诸于国内政治人物之惯常手法, 即以讨价还价方式, 先把价码抬高, 再让对手折价以取得阶段性妥协(访谈郭全强, 居銮, 2007年6月18日; 访谈郭洙镇, 吉隆坡, 2007年7月6日)。

政策宣布两个月后, 教育部就以前所未见之效率, 仓促拟出了自2003年初新学年开始, 就要在小学一年级、中学一年级及先修班一年级同步实施该政策的规划。换言之, 对此重大变革, 教育部竟无任何试点或先导计

划 (pilot scheme) 的渐进安排。如此急进的政策逆转难免争议, 支持与反对的混杂声浪迅速涌现, 族群内部的分歧在这问题上也相当明显, 国内三大族群——尤其是马华和马来社群内皆有正、反两大阵营之辩。不过因主流媒体多直接或间接地操控于执政诸党之手, 加以正、副首相及部长们纷纷以《内部安全法》要挟反对该政策的“极端份子”、“种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 马来社会及印度社会的反对声浪, 很快就在主流媒體上消声匿迹。惟以董教总为首的华社反对舆论依然聒噪, 于是该怎么面对数理英化政策, 很快就成了华人 / 华基执政党的烫手山芋。⁹

华教界及多数华团所争取的, 是华小能继续以华语教授数理, 而自外于该政策之施行。如前所述, 国民教育体制内的华文中学, 早在1961年教育法令实施后就已不存, 所以华小既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根柢, 更是主体。而历经1970及80年代执政者多次欲调整华小教学内涵的风风雨雨后, 华教界对相关措施之戒心可以想见。在华社舆论的强大压力下, 马华公会和民政党虽已分别在2002年的10月及8月就公开反对过华小数理英化, 但在强势的马哈迪及巫统政治意志笼罩下, 国阵最高理事会议于2002年10月22日就已“达致共识”, 要求全国各类型小学一体适用该政策, 华小也不例外。两党既无力扭转政策主轴, 唯有私下运作, 并找来另三个华基执政党共议折衷之道。

马华公会、民政党、砂拉越人联党、沙巴进步党与自由民主党随后向首相要求一周的咨议期, 以提出可行的政策微调方案。惟自由民主党的主席章家杰, 翌日就转而表态支持马哈迪的决定, 不再与另四党商议此事。于是专为华小量身订做的“2-4-3方案”, 就在这妥协背景下由各党高层政治人物经密室商议而生。¹⁰ 所谓2-4-3方案, 是指华小的一年级学生须自2003年起, 每周要上2节的英文课 (华小按规定原是从三年级起才修习英文), ¹¹ 并在以华语教授的数学和科学课外, 另修习以英语教授的4节数学和3节科学课, 如下表所示:

表一：华文小学以双语教数理的“2-4-3方案”（第一阶段）

科目：	英文	数学	科学
华语授课节数（每周）		6	3
英语授课节数（每周）	2	4	3

2-4-3方案显然是试图以所谓“双语”教学（事实上教学内容重复）让各方皆大欢喜、面面俱到。如此折衷方案出于一众重量级马华政治人物之手，虽不乏往例，但影响深远的教学语言规划竟然可以不经教育专才之手，反沦为执政者在密室内斤斤计较、加加减减并于一周内即定案的荒谬现象，无异映照着马来西亚语言政治的敏感与现实。譬如据当时曾亲身参与此过程的民政党署理主席郭洙镇透露，四党经内部商议及向特定人士咨询后，¹² 提交国阵最高理事会的方案原是3-3-3。不过会中马哈迪认为，数学一科最重要，3节不够，于是又将它调整为2-4-3。此外，2-4-3方案乃专为华小而设，国小和淡小皆无类似的双语教学安排，际遇有别，巫统政治人物对此很有意见，马哈迪遂不得不耗上两、三个小时的会议时间，来说服其巫统同僚接受方案（访谈郭洙镇，吉隆坡，2007年7月6日）。

无论如何，经过约半年的忙乱准备后，数理英化政策终如期在2003年初于全国所有的中、小学校推行。结果一如所料，因与教学原理扞格及教育行政上配套不足（如英语师资良莠不齐）所衍生的扰人问题，不久即逐渐浮现。这当中最严重的，莫如乡区马来学生因调适不良，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的问题。乡区学童周边的英语资源，远不及都市小孩，部份学童甚至没上过幼儿园，结果一上学就面对数学、科学两科以完全陌生的英语教学，不仅数理学习成效不彰，英文科也未见起色（Shaharir 2005; Abdullah 2007）。2005年3月26日在吉隆坡召开的“第二届马来人教育大会”（*Kongres Pendidikan Melayu Kedua*）上，更有学者发表报告指出，马来学生在此措施下，未来或有高达五十万人因无法掌握英语而被迫辍学。不过这类数据似有夸大之嫌，其调查方法严谨与否也难以窥知，笔者对此不无保留。¹³

其次,各校普遍都面临合格的英语数理教师严重缺乏的难题。教育部虽在首相马哈迪敲定政策后,就火速办理了不少梯次的教师英语再培训课程,但一来师训界英文教学的断层已久,教师的英语素质难以凭短期的培训课程拉拔;二来则即便是培训班本身的教学质量,据不少曾参与过相关课程的老师反映,恐怕也很有问题。¹⁴ 于是在教育部督学眼角以外的真实教学现场,不少教师要不是勉强使用着不太正确的英语授课,要不就索性仍以原来的教学语为主进行讲解。而华小方面因有别于国小、淡小,采用了特殊的数理双语教学模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尤其普遍。譬如不少华小校长经由校长职工会这一平台所达致的默契,就是英文数理的考试照考,成绩也都上呈予教育部参考,但却不将它纳入学生的学年分数总计(即成绩报告册上的总分),试图以此降低英语教数理的冲击,另一方面也维持了华语数理的主导地位(访谈彭忠良,吉隆坡,2007年11月1日)。¹⁵

但即便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华小在政策执行近三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底,还要面对另一项让华教界焦躁的技术性麻烦:在2-4-3的双语数理教学方案下,华小第一阶段(即小一、小二、小三)的节数,其实已达到了教育部所规定的小学每周授课不得逾50节的极限。¹⁶ 然而华小的第二阶段(即小四、小五、小六)因科目增多,数理方面如果还是依2-4-3方案授课,那总节数就必然会超过50。华教界不免又要担心政府会藉此机会,进一步削减以华文教授数理的节数。正是在这样的焦虑背景下,2005年12月10日,董教总成功结合了六百多个民间团体,在加影(Kajang)的董教总行政中心办了个三、四千人的大集会,再度要求反数理英化。这场集会的特殊意义,是参与者并不限于华人,而是难得地首度有三大族群的代表,包括来自马来民族主义及文教团体者,针对一项语言议题持共同的反对立场。¹⁷

马华公会因华小第二阶段的新安排,再度面临压力,时任总会长的黄家定乃亲自与教育部长希山慕丁(Hishammuddin Hussein)私下协商解决之道。然而黄家定以希山慕丁为协商对象,其实已再度彰显国阵内部权力失衡的现实,即马华公会和巫统早非平起平坐的伙伴。巫统的希山慕丁虽

辖教育事务，却非资深部长。论地位，久任内阁部长高职的黄家定若亲自出面，理应直接与巫统主席——即马哈迪的继任者首相阿都拉（Abdullah Badawi）商议此事。¹⁸ 这场过程隐晦的典型“国阵协商”，结果一直拖到了距新学年开学已不足半个月的2005年12月23日，才终于谈出结果。当权的重量级政治人物不惜再度为华小各科节数的加加减减绞尽脑汁，替华小第二阶段之数理教学设计出所谓的“6-2-3-2方案”，即以华语教授的数学课维持每周6节，以英语教授的数学课则减至2节，另外以华语教授的科学课也维持每周3节，以英语教授的科学课则减至2节，如下表所示：

表二：华文小学以双语教数理的“6-2-3-2方案”（第二阶段）

科目：	英文	数学	科学
华语授课节数（每周）		6	3
英语授课节数（每周）	4	2	2

6-2-3-2方案的一大重点是：政策虽未回头，华语数理的节数却并未较华小第一阶段时减少，华教界的焦虑遂暂时得以纾缓。¹⁹ 此后因政府仍一再表达坚定的政策推行立场，不少华裔家长也由始至终态度暧昧，有别于各大华团的积极反对姿态，反数理英化运动的锐气渐失。不仅马华社会如此，就连一向与董教总紧密合作反对数理英化的淡米尔文教团体，也对淡米尔文的前景益趋悲观，并抱怨董教总态度不够积极（访谈Arumugam Kalimuthu，吉隆坡，2007年11月5日）。²⁰ 而马来社会方面，因反对意见不无牵动巫统选票的风险，尤其遭政府刻意地箝制、消音。譬如国家语文出版局（*Dewan Bahasa dan Pustaka*）原是马来语文民族主义者的大本营，政策倡议之初也一度颇多批评，甚至藉由与出版局关系密切的马来西亚语言学会（*Persatuan Linguistik Malaysia*），连出了几本驳斥官方论述并捍卫马来语地位的书籍，如*Keranda 152: Bahasa Kita, Air Mata dan Maruah Kita* (PLM 2002) 和*Suara Pejuang Bahasa* (Abdul Rahim & Awang 2005)。不过出版局成员的公务员身份，很快就让他们在压力下噤声。

2007年开始，随着第一批以英语学习数理的小学生即将在翌年完成小

学教育并面对小六检定考试(UPSR),华教界又进入另一回合的焦虑。本次焦点主要是担心小六检定试里的华小数理科试卷,届时若纯以英文而非中、英双语出题,那华小同样大势已去,离变质不远。尤其教育部迟迟不愿宣布相关安排,更是启人疑窦。董教总遂于2007年7月8日,又邀集了三大族群的相关团体,在其加影行政中心发起一场要求恢复小学数理母语教学的运动。然而若将此活动和它在2005年底发起的那场大集会相较,活动已是由户外走向室内,用词则是由“反对”沦为“要求恢复”,而人数方面由数千缩减至数百人,明显可见其势已衰。

有趣的是,就在民间反数理英化的声势渐弱之际,2007年10月27日,首相阿都拉却终于在出席一场华人文化晚会时宣布,2008年的UPSR华小数理科仍将以双语出题(《星洲日报》,2007年10月28日)。²¹所谓双语出题,乃是备好两份各以华文和英文出题的数理科试卷,供考生自由选择。教育部长希山慕丁稍后更首度承认,数理英化后教学成效至今不彰,乡区马来学生尤难应付,只好维持中、小学数理科试卷都以双语出题,以减少其负面冲击。换句话说,2008年的小六检定考试不仅华小如此,就连政策上早已经纯用英语教数理的国小、淡小亦然。而中学阶段的初级教育文凭试(PMR)及教育文凭试(SPM)的数理科,也同样维持双语出题。此后不少有份量的马来政治人物,包括首相女婿——巫青团副团长凯里(Khairi Jamaluddin),就开始频频发言要求恢复数理科母语教学。2009年7月8日,阿都拉下台后继任的纳吉内阁,终于宣布自2012年起,各源流小学将逐年逐级恢复使用母语教授数理;而国民中学亦将恢复以马来语教授数理。数理英化政策辛苦走一遭,于焉回到原点,所遗者仅中六和大学预科班往后将持续以英语教授数理科目。²²

四、解析与讨论

(一) 政策动机

由数理英化政策自倡议到推行期间的种种迹象来看,其决策显然未经

官僚体制内一个相对漫长的集体酝酿过程，而是由高层领导强势发动。由于本研究未能成功访谈马哈迪本人，有关其动机的议论，遂有赖于旁敲侧击的间接佐证，难言有力。只是政策动机与后续的讨论相关，仍值一探。

马哈迪自政策的倡议阶段始，就曾明言这是个政治决定。政策由他直接发动，并未经教育部的专业评估与规划。2002年6月22日，也就是距他倡议数理英化后不过月余，马哈迪再度出人意表地在巫统第五十六届常年代表大会上，含泪宣布辞去党主席一职。巫统的政治惯例是党主席必为首相，卸任党主席就意味着他也将卸下首相一职。经会场众人劝说后，马哈迪虽同意留任至2003年10月以利交接，但显然去意已决。所以合理推断马哈迪离职前仓促推行数理英化的动机，大约不出两点：其一，这是个他认知中的迫切危机，已不容再磋跼。其二，马哈迪应该心里明白如此争议性的政策，若非出自他这强人之手，其继任者未必撑得住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排山倒海而来的强大压力。或者更坏的情况，是新首相根本就不愿正视危机，拒图此重大变革而贻误时机。马哈迪曾在1970年代英校被迫转型之际，以激进民族主义者之姿担任过教育部长（1975~1978），如今时移势易，他似乎要背负更沉重的历史责任去“导正”局面。董总主席任内（1993~2005）曾与马哈迪有过不少交手经验的郭全强，对此亦持相同看法（访谈郭全强，居銮，2007年6月18日）。马哈迪多年来的内阁同僚郭洙镇，也在2007年7月6日的访谈中基本同意笔者的观察。不过他认为马哈迪其实早就意识到这问题严重，只是1980年代中期以后马哈迪曾深陷党争困扰，1990年代中期以后则又因亚洲金融危机和他罢黜副手安华引发的政治动荡无暇他顾，以致延误至今。至于安华本人，倒是不愿在访谈中对马哈迪的个人动机置评。但他与杜乾焕都认为马哈迪的威权领导与自负性格，才是他一意孤行、不考虑专业意见的关键（访谈Anwar Ibrahim，八打灵，2007年6月4日；访谈杜乾焕，乔治市，2007年11月12日）。

值得注意的另一點，是像“复办英校”这类构想，竟能浮现于政策讨论初期。回首廿年前，巫统党内恐无一人敢有此念头。此外，复办英校之议，最终虽是遭巫统最高理事会腰斩，惟数理英化下的学校教育，实际已和英校相去不远。这种情况尤以小学为然，此因国小的主要科目只有四

科,即国语、英语、数学、科学;华小和淡小这类国民型小学,则是需要多学习一科华文或淡米尔文。至于“公民”与“道德教育”这类较为次要的科目,则根本不是小六检定试的考试项目。数理英化政策毋宁是个规避或至少试图弱化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炮火的迂回之计,却未必完全契合决策者的初衷。

然则马哈迪眼中的迫切危机,真实性如何?政策推行之急促,让人不得不探问其背后驱力。全球化对马来西亚语言生态的冲击,首先表现在公、私领域昭然的语言差异上。1970至80年代,因官方独尊马来语,不仅英校消失,各级政府除东马的沙巴、砂拉越两州政府外,其行政用语也从实质双语迅速转向单语,以致公领域成了由马来语文鲜明主导的场域。不过因私领域的民间——尤其是工商企业界——仍受英语宰制,且华语和各类华南方言(如粤语、闽南语)及淡米尔语等也都占有一席之地,公、私领域之间的语言差异,开始变得十分明显。起初马来人对此多不以为意,因马来学生可透过族群配额保障,相对轻松地入读公立大专,毕业后再经由另一套配额保障,轻松进入他们一般最向往的公家机构任职。然而1990年代后,政府作为大专毕业生最大雇主的角色不再,²³私领域则随着国内经济腾飞,超越公家机构而跃居为大专生就业的主要场域。与此同时,政府开放民间创设私立大专院校的自由化举措,又迅速造就了一如公家机构与工商界在语文应用上的二元分化,即公立大专的教学以马来语为主,私立院校则几乎全用英语。²⁴两项因素交缠,遂导致以马来人为主体的公立大专毕业生严重之失业问题。

另外,与“公领域/私领域”重叠的除“马来语/英语”外,还有“马来人/非马来人”分化的老问题。马来西亚虽拥有多元的族群人口,其政治上的主要裂隙,多年来却仍是落在马来人与非马来人之间,而非一般人所认知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其他,或土著与非土著之间。²⁵就教育境遇来说,华、印裔学生因处处受限,难于挤进公立大专的窄门,亦难获取公费奖学金,只好自付昂贵得多的学费入读本地私立大专,或索性留学英、美、加、澳等英语系国家。结果其求学经历固然艰辛,毕业后面面对私领域的就业市场,却往往会因语言优势等而较公立大专的马来毕业生顺

利许多。所以长远来说,公领域/私领域、马来语/英语、马来人/非马来人的三叠现象,确是马来人竞争力的隐忧。马来西亚著名的政经学者、目前担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的佐摩(K.S. Jomo),早在1994年就曾指出:

讽刺的是,马来学生反成了英文程度下滑的主要受害者。他们是在踏入就业市场之际就遭到惩罚的那批人。非马来人基本上都通三语,一般也就应付得稍微好些。这种局面,对马来人实在是极端不利。(New Straits Times, 2 January 1994, p.8. 笔者中译)

马哈迪恐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亟欲求变。有谓其数理英化政策主要原是针对马来族群而来,本应与华小无涉,但他也了解若不对华小、淡小一体实施,则势必无法平抚马来社会的强烈反弹(访谈郭洙镇,吉隆坡,2007年7月6日;访谈李成材,吉隆坡,2007年8月7日)。时任马华公会中央教育局主任的李成材上议员还提到部份巫统政治人物虽不赞成马哈迪的倡议,却不敢撻其锋,只好借着“拉华小下水,盼华社把它闹大,最后一起拉倒”。马哈迪面对“要改一起改”的反弹声浪,乃向“原本坚决反对该政策在华小实施的马华”施压。不过这一点笔者并无法亲自向巫统当事人求证。其次,马哈迪或许也视此为一统国内多元教育体系的历史良机,藉由将英语落实为各类型小学共通的主要教学语之便,以另类途径达致国家自1950年代以降即追求的所谓教育“最终目标”(访谈郭全强,居銮,2007年6月18日;访谈许海明,北海,2007年8月11日)。然而华社的抗拒,却似乎颇出其意料之外,而这与族群间和族群内部的语言颀颀有关。

(二) 语言政治的张力

马来西亚的语言生态虽然丰富,要角却不多。英语虽在1970至80年代受挫,民间优势犹在,近年来更随全球化的大潮复盛。马来语作为国语,则有国家机关作其坚实后盾,处境安稳。至于华语,虽屡受冲击,却因华社基于文化信念与族群认同而顽守多年,至今未衰,更多少受惠于整

个大中华经济圈崛起的势头。1996年启播的私营卫星电视——寰宇电视(Astro), 可谓彰显这方面影响的具体而微案例。寰宇电视经由其购自中、港、台等世界各地的五花八门频道, 不仅让马来西亚华人超越早年国营电视台的局限, 更贴近整个大中华经济圈的脉动, 也让他们开始见识到华语文在资讯与知识传播上的实用价值。此外, 自1997年起, 全国华小持续都有总数约五、六万名的非华裔学生就读,²⁶ 这当中扣除西马的印裔及东马的非马来裔土著学生后, 每年仍有约略一万多名的马来学生就读华小, 其意义非凡。²⁷ 相比之下, 淡米尔语虽是马来西亚印度人社会内部的强势语言, 却因该族群长期人寡势弱而位处边陲。²⁸ 所以国内的语言要角, 惟英语、马来语和华语, 三者虽因影响力不均难言“鼎足而立”, 但就国内日常的语言生态来说, 三语并存已渐成常态。例如本土商界迄今虽仍由英语菁英主导, 但为争取规模可观的华语文客户群, 近年来在广告、说明书、商品标示、公司网页及为客户提供的询答服务等方面, 也都会尽量在英文及马来文之外, 加设华文, 至于淡米尔文, 则是行有余力之大企业才可能提供的选项。

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与华教人士在1967年《国语法》制定前喧嚣的1960年代, 曾互视为寇讎, 惟晚近发展似已让两者都逐渐意识到, 英语才是他们可畏的“共同敌人”。英校消逝有利华小与华文独中复兴的现象, 或可让我们据此推断华裔家长不论是出身华文或英文教育背景, 其语言优位之排序, 大多恐怕仍是英语优先、华语次之、马来语殿后。眼下既无英校可选, 那就宁选华小, 也不愿送小孩去国小。否则华小不无可能如新加坡于1970至80年代所经历过的转折般, 在政府力倡英校却保留华校供家长选择的情况下, 还是因新生逐渐流失而遭淘汰出局。不过如今高达九成华人子弟入读华小的结果, 倒成了马华内部华文与英文教者出身之两大群体间松散的接合剂。换句话说, 小孩就算家里讲的还是英语, 至少接受过六年的基础华语文教育, 有能力和其他的族群成员用华语沟通, 也更了解(虽不一定赞同)华教人士捍卫华语文的文化执着。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壮大了华教运动的民间基础与正当性。这种改变反映在语言政治上, 就是华裔政治菁英不论朝野, 历来虽多是出身英文教育者, 但在面对华小的数

理英化争议时，仍不敢冒政治风险去公然挑战董教总和其他许多华团的立场，乃尽力促成特殊安排，减少政策对华小的冲击。

然而吊诡的是，这回反倒是不少华裔家长态度暧昧、欲拒还迎。个中的族群内歧异，值得细论。就笔者于2006至2007年间针对数理英化政策和特定人物及一般民众的正式访谈与私下交流所见，大致可分三种回应。粗略地说，第一类回应是：不少华裔家长——年轻家长尤其如此——其实并不排拒甚至欢迎小学阶段的数理英化政策。他们多不认为这有损华小的华校特质，也相信（或迷信）孩子们很快就能适应非母语的数理学习。至于中学阶段，则近乎一面倒地希望政府索性复办英中。²⁹当然华裔家长的观点难免受许多因素（如地域与世代差异等）影响，笔者既无法提供相关的统计数据为佐证，这类观察犹待检验。

第二类回应，则是坚持华小以母语教授数理，或顶多接受华小附带教授英文数理词汇，但对中学阶段则是乐观其成，更乐见政府复办英中。我所访谈过的华小校长、华团领袖及华裔政治人物，基本上都持类似看法（访谈彭忠良，吉隆坡，2007年11月1日；访谈周世扬、张志开、李国辉，2007年5月28日；访谈莫文翔，汝来，2007年7月5日；访谈李成材，吉隆坡，2007年8月7日；访谈刘天球，八打灵，2007年8月7日；访谈章瑛，北海，2007年8月10日）。³⁰事实上不仅马华社会，我所接触过的“马来西亚淡米尔文教育研究与发展基金会”（Malaysian Tamil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领导人，如Arumugam Kalimuthu和A.V. Kathaiah（吉隆坡，2007年11月5日及6日），虽坚定捍卫淡米尔小学的存续与发展，也都明确支持复办英中，不认为淡米尔中学有存在的必要。访谈过程中，这类受访者往往爱追忆昔日英校时代的“美好时光”，对英校校园内各族群学子们和乐共融与英语对答流畅的过去缅怀不已。简言之，他们的基本认知是：华小六年是底线，务必捍卫；但六年的华文根基大致已足，中学阶段则应务实地转用英语教学，将华文保留为语文科目即可。至于这种“两边图利”的模式其教育实效如何，则少有人深究。

第三类回应，则是以董教总为代表的立场，即坚持中、小学两阶段皆以母语教授数理科目，才是最理想的状态（访谈钟伟前，加影，2006年11

月24日；访谈姚丽芳、叶翰杰、余裕忠，加影，2007年5月30日；访谈莫泰熙，加影，2007年6月1日；访谈郭全强，居銮，2007年6月18日；访谈柯嘉逊，加影，2007年8月9日；访谈许海明，北海，2007年8月11日；访谈刘锡通，八打灵，2007年10月29日；访谈叶新田，吉隆坡，2007年11月19日）。惟如上所述，持这类立场的华社成员似已渐成非主流。于是有别于马华教育之前的许多危机事件，董教总在反对数理英化政策的论述上备觉艰辛，反倒由马来语言民族主义者的反对论述上获得奥援。

至于马来社会方面，争议的焦点，恐怕是众人对马来语实用价值——尤其是它中介科学知识的能力——的不同判断。前已述及马来西亚公、私领域截然分化的语言生态，长远来说，对身为既得利益者的马来人其实并不利。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及主要科技语文的角色，让当前的马来民族主义者，陷入了一个棘手困局。1970至80年代，当国家的语言规划活动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语言规划者往往爱举日本为范例，说明一国国语作为教学语文，一样可以协助国家成就先进工业国的地位。不过以马来西亚今日的经济规模及马来语文相对浅薄的文化传统来看，两者显然并不可比。此所以1993年，当马哈迪首度尝试恢复以英语作为部份大专科目的教学语时，曾语重心长的说了以下这番话：

我们需要这么做。政府的看法是：我们若能成就为一个成功的民族，那我们的语文，自然就能得到他人尊崇。反过来说，一个不成功的民族，就算坚守其语文，还是无法为他们赢得各方的尊崇。（*New Straits Times*, 28 December 1993: 2. 笔者中译）

这种务实的语文观在马哈迪看来，不仅无碍民族主义，更是真正地为其民族的未来着想，却也必不见容于一贯强调“语文是民族生命”（*bahasa jiwa bangsa*）的传统马来民族主义者。彼此间的深刻歧见，在数理英化政策一役上表露无遗。马来政治菁英不论朝野，都终将面对这两难抉择。时任伊斯兰党署理主席的纳沙鲁丁（Nasharudin Mat Isa）就认为数理英化政策是个好政策，只是推行得过于仓促，很多方面都没做好准备，尤其师资。所以若能完善政策配套，他乐观其成。“数理科毕竟只是

技术科目，用英语无妨。”（访谈Nasharudin Mat Isa，吉隆坡，2007年11月1日）安华则甚不以为然，认为若要提升国民的英文程度，重点并不在此，且这将影响马来语作为国内共通语的功能。不过安华虽强调大学阶段确实该注重各专业领域之英文，教学语可弹性处理，却回避了笔者就中学阶段教学语立场的提问（访谈Anwar Ibrahim，2007年6月4日）。无论如何，因政策推行得实在过于仓促，规划不良、准备不周，乡区马来学子受害甚深，加力强人马哈迪已不在其位，草根马来民众的压力，遂逐渐逼得英文教育出身的一众马来政治菁英屈服，终让政策折腰。简言之，马来社会在这方面的内部歧异，或许不如华社表面上来得喧哗，却因事涉语言之文化与实际功能的基本看法（即语言意识形态），而更加难以在短期内调和。

凡此种种，我们若以Bernard Spolsky“语言政策”之分析架构来检视马来西亚当今的语言生态，当可轻易发现其张力所在。这种张力主要源于它在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及语言实践这三个层面，都很不一致。

首先，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独立初期曾一度颇为暧昧，自1970年代起则相当稳定。马来语作为唯一国语及官方语的宪法地位，至今不曾动摇，惟2002年数理英化倡议的出现，却似意味着它也许正悄悄经历着一段类似“典范转移”的过渡，也就是从独尊马来语的单语意识形态，逐渐转变为比较务实的双语思维。一方面，国家虽仍极力维护马来语的象征地位及其文化价值；另方面，却不无逐渐架空马来语的实用性（即限缩其语文功能）而代之以英语的意味。这样的转变，一为顾及国家尤其是马来民族的长远利益，二则是直接缘于马来西亚社会整体在语言实践上，多年来顽抗拒变所造成的它与国家语言意识形态之间的严重落差。无论如何，数理英化政策之受挫，说明了国家语言意识形态这可能正在进行中的典范转移之过渡，远未完成。

马来西亚社会的语言实践，则是显然从未逸出“多语”的框架，不同时代间的差异，或许只在语言优位排序上的些许变化。譬如1970至80年代马来民族主义高张期间，马来语借着各项语文律例与行政法规之助（例如联邦和各地方政府对招牌及广告文字的规范），就明显压制了华语文的应

用,但却无法迫其走向消亡,遑论英语。而晚近以来全球化浪潮下英语(及某种程度上中文/华语)的冲击,更是首先强烈地反映在民间私领域的语言实践上,遂进一步拉开了它与国家语言意识形态之间的落差。

至于说到国家的语言管理,则无疑是从独立迄今最为反复不定的一个层面,五十余年内由英语主导一变而为马来语宰制,然后又逐渐地往回摆。国家具体落实在教育领域的语文相关政策与措施更是反反复复,让学生、家长、教师都难以适从,也因此制造了好几个世代的语文教育“白老鼠”,遗患至今。然而国家的语言管理之所以反复不定,恰恰是因为该领域乃国家企图调整语言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落差的关键领域。换句话说,要改变现状,就得透过具体的语言政策为之。不过药方若不得法(譬如到底该确立为双语或多语的教育体制等),或是依然无法摆平族群间及族群内部的语言歧异,那就只好推倒重来。

五、小结:数理英化政策会否再来?

马来西亚的语言意识形态、管理与实践诸层面,既然都存在落差,则张力难免。这种不一致也逼使执政菁英不得不正视现实,重新调整官方思维。而在试图使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与社会上的语言实践契合的过程中,语言管理是关键,数理英化政策正是这方面的一项重大变革。惟数理英化政策之惨淡收场,说明的问题恐怕不是马来西亚社会拒绝调整,而是政策本身并不得法,各族群间及族群内部也远未就此达成共识。马来西亚独特的族群政治运作,则为共识之酝酿,加添了许多变数。然而如果语言的意识形态、管理与实践诸层面的落差持续,那仅仅将教育体制回复至2003年前的原状,显然不是解决问题之道。此所以政府在以逐年逐级之方式恢复中、小学校之前的数理科教学用语时,也做了有别于“前数理英化政策时代”的一些调整。

首先,复办英校是否选项?如上所述,马来西亚民间(尤其华社和印度人社会)不少人对此颇有热盼。且复办英校既能部分回应全球化下的语言挑战,亦不失为调和国内公/私领域语言失衡的办法之一。然而巫统政

治菁英显然已经由数理英化政策推行期间之纷纷扰扰意识到，目前如倡议复办英校，那会连族群内的分歧都无法跨越，遑论其他。不过数理英化政策本就是近于复办英校的迂回之道，此路不通，执政者自然还有其他的迂回方案可以考虑。

严格来说，数理英化政策并非白走一遭。该政策的遗绪之一，就是大专阶段的教学语问题基本上已经取得共识。英语的强势地位获得确立，马来语则即便是在公立大专内也逐渐趋于弱势。其次，大专以下，中六和大学预科班也得以维持用英语教授数理科目，某种意义上已是恢复了中六阶段的“英校”。至于中、小学阶段，教育部当前的口号是“巩固国语、加强英语”（*Memartabatkan Bahasa Malaysia & Memperkukuh Bahasa Inggeris*），至于如何“加强英语”，则弹性颇大。一如数理英化政策，执政者的心思，显然主要仍是放在如何以任何手段提升马来人的英文水平以强化其竞争能力上，焦点其实不在华小与淡小。而除了对英文师资、教学时数、教学法、教材等等的配套作改进外，晚近比较值得注意的发展，还有玛拉理科初级学院（*Maktab Rendah Sains Mara*）将在2016年全面落实“双文凭试”的规划，即让以马来学子为主体的玛拉学生同时考取国内的马来西亚教育文凭（SPM）及英国的国际普通中学教育文凭（IGCSE）。这当中的玄机，是两项文凭试的数理科目课纲其实大同小异，差别只在教学语文。而首相纳吉的国会选区——彭亨州北根的玛拉理科初级学院，则是首间实施“双文凭试”新制的玛拉学院（2011年）。

同样值得关注的变化，还有近年来英文私校与国际学校在马来西亚的蓬勃发展。城镇地区的中产阶级家长——不论其族群背景——崇尚英语教育的趋势已愈发明显，数理英化政策之难以为继，让他们倍感失落。面对该群体复办英校的要求，政府的折衷之道，是于2006年起开放本国学子入读国际学校，更进一步放宽管制，让更多英文私校得以设立。国内的私立英文中、小学目前已达133所，国际学校则共有14所（教育部私立教育组资料，转引自吴珍妮等2013），数量虽不算多，且多集中于大巴生谷及新山地区，但学生增长的势头明显。尤其不少华裔学子是在修毕华小课程后才转往英文私校及国际学校就读，即达成了前述之“华小衔接英中”模

式，惟以付出高昂的私校学费为代价。民间社会以其教育方面的自主实践，继续抗衡着在他们眼中不合时宜的国家语言意识形态与教育政策，可见中学阶段在这方面的未来发展，变数犹多。

我们从以上种种变化，当可观察到当前不论是国家的语言意识形态、语言管理或社会上的语言实践，都还在尝试调和彼此间的落差，并未觅得一个主流的妥适之道。至于一套契合马来西亚国情的语言意识形态究竟为何？马来西亚在语言管理上又是否逐渐贴近香港模式甚至新加坡模式？这些问题都只能另文处理了。

注释

- 1 严格来说，《1961年教育法》实施后接受改制为英校的各家华文中学因董事部尚在，虽受政府资助，却非公立学校，所以应为“国民型”中学而非国民中学。不过后继的《1996年教育法》再无国民型与国民中学之辨，一律以国民中学视之，国民型中学董事部的法律地位与权力遂受影响。对此马华社会近年来已渐有要求政府为国民型中学“正名”并尊重其董事部权益的呼声。
- 2 举例来说，据马来西亚教育部学校组历年出版的《小学资料统计》所示，1993年在华小和国小就读的华裔学生，分别占总数的88.45%及11.55%；而到了1999年时，该比例则是微幅调整为90.92%比9.08%（转引自沈天奇 2006: 68）。换句话说，马华适龄学童入读华小的比例约在九成左右。不过马来西亚教育部向来视华小、国小学生的族群比例为敏感数据，并不常对外公布细节。
- 3 其实独中对各科的教学语文政策不一，因校而异，并不全都是以华语文授课。某些独中的数理科目因采英文教学，送孩子入读的家长，考虑的或是孩子未来留学海外时易与当地的英文课程衔接，而不必然与他们对华文教育的认同、执着有关。
- 4 这种现象持续多年，尤以公立大专的马来毕业生为然。譬如根据2005年的一项官方调查，在近六万名待业的大专毕业生中，出身公立大专的就占了81%。而由于配额制导致马来学生占公立大专的绝大多数，这也意味着待业的大多是马来毕业生。至于他们觅职、面试时受挫的原因，经这些毕业生自我评估后，可以发现三项主因之一，就是“英文不佳、沟通技巧不良”（*New Straits Times*, 3 November 2005, p.12）。
- 5 1970至80年代“新经济政策”雷厉风行期间，官方奖学金几乎全数分派给所谓的“土著”（*bumiputera*，主要即马来人）学生，非土著学生只能自求多福，筹资出国留学。这种极度偏颇的族群差别待遇，一直要到1990年代马来西亚经济一

片大好、族群关系稍见和缓后，才小有改善。

- 6 马哈迪的观察来自郭洙镇的转述，见笔者与郭氏2007年7月6日在吉隆坡的访谈。郭洙镇曾是活跃于1970及80年代的华教工作者，并以律师身份代表独立大学有限公司和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打过官司。郭氏参政后，曾长期担任民政党的署理主席（1989-2005），并官至联邦政府副部长。
- 7 自1987年起，马来西亚经济曾连续十年维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至1997年遭金融风暴波及后才严重受挫。近年来国内经济虽已恢复增长，但大多只能盘桓在5%左右的增长势头，已不复当年盛况。
- 8 1969年五一三族群流血冲突后国会曾遭暂停运作，《1971年煽动法》正是国会于1971年恢复运作后制定。该法明文禁止任何触及族群“敏感”议题的文告、辩论或讨论，而这类议题包括土著特权、国语、马来统治者的主权，以及非马来人的公民权。
- 9 国民阵线（国阵）作为执政联盟，当时共计有14个成员党。巫统的政治实力远非其他盟党可比，也是集团内唯一的马来人政治代表。不过集团内的华人／华基政党倒是不少，除马华公会外，还有民政党，砂拉越人联党，沙巴进步党和自由民主党。
- 10 事实上，各党内部当时也有不少分歧意见，但都没有公开在台面上讨论，外界多不知其内情。举例来说，时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及马华公会副总会长之一的翁诗杰，就曾有过另类的“双语”教学构想，即华小自四年级开始，才修习中、英词汇并列的数理课本，且由同一位老师以华语授课，藉此让学生逐步熟悉数理英文词汇，以利衔接国中阶段的纯英语数理教学。但他当时并非党内的主流派，其构想不仅未获重视，还因此遭到政敌攻击（访谈翁诗杰，吉隆坡，2007年11月14日）。马华公会内部的A、B两队派系之争，当时确实让局外人更看不清相关安排之决策过程。
- 11 2003年前，华小若严格依循教育部之规定，本是从三年级起才教授英文，国小方面则是一年级起就设有英文科。华教界多年来虽不断要求将英文科提前至小一开始，教育部却总是以华小学生须修习三语，恐学子负担过重为由维持该规定。然而事实上，华小校长多年来大多设法挪动课时，以违规方式让学生自小一开始就修习英文。
- 12 笔者也曾就相关细节访谈过两位曾参与拟定该方案的特定人士，并向他们一一求证。不过因两位受访者都要求匿名，文中不便透露与他们有关的任何细节。事实上，据某位特定人士的说法，他本人建议的方案原是2-1-1，即意在维持以华语教授华小的数理科目，而只各以1堂课的时间来额外教导学生数学及科学方面的英文词汇（访谈J先生，吉隆坡，2007年11月20日）。
- 13 该报告的研究成果当时曾引起广泛关注，但官方随后即压制了马来媒体在这方面的报导。
- 14 我曾向不少现职的教师、校长询问过教育部英语再培训课程的状况，得到的评论

多是讲师本身即良莠不齐——某些讲师的英文根本不济，遑论培训他人以英语教学。而培训时间不足，也是一大问题。此外因资源有限，东马方面往往是先派出少数“种子”学员赴西马接受再培训，结训后回到东马，再将所学传授给各城镇区的教员，最后才及于偏远地区的教员。因受访的教师、校长人数众多，这里未一一列出访谈者的姓名及访谈的时、地信息。

- 15 彭忠良为全国校长职工会总会长及吉隆坡德威伸路州立华小校长。事实上，就教育部的各项要求与行政安排来看，它所“承认”的仅是英语数理，华语数理则是政治介入下它不得不容忍的辅助性教学措施。例如教育部指示华小必须采用和国小、淡小一样的英语数理课本，并在华小学生的课本借贷计划中停止供应华语数理课本，而只提供英语数理课本。此外更重要的一点，是教育部官员完全无视华语数理之教学，只派员督导、视察英语数理的教学进度与成效。有关政策执行上的种种细节及华小校长、教师们如何“阳奉阴违”的因应策略，这里不赘，详情可参考（教总 2007；张荣强 2008）。
- 16 相较而言，国小和淡小因无双语教数理的特殊安排，其小学第一阶段的每周节数自政策实施以来，只是由2003年前的45节增至46节。
- 17 总括而言，在数理英化政策推行期间一贯持坚定反对立场的马来民族主义及文教团体，主要有马来西亚语言协会、语文出版局雇员工会、西马马来教师工会、马来西亚作家联盟、马来西亚翻译协会、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马来西亚回教学生协会、马来西亚历史协会等。印度社会方面，则有马来西亚淡米尔文教育研究与发展基金会、马来西亚淡米尔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印裔协会、马来西亚印裔青年理事会等。而华社方面，反对阵营尤其强大，除民间华教界的领导机构董总及教总外，还有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七大乡团、全国校长职工会、马来西亚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总会（校友联总）、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留台联总）、马来亚南大校友会等。
- 18 马哈迪是在2003年10月31日退休，交棒予阿都拉。
- 19 当然华小教师在6-2-3-2方案下，仍面对不少授课上的麻烦。譬如华小与国小的课纲一致，数理教学内容必须跟上国小的进度，但华小第二阶段的华语数理节数因被英语数理分去不少，与国小相差太多，教师往往就赶不上进度，科学一科尤其如此。为解决这问题，华小的某个弹性作法就是尽量派同一位教师教授华语及英语数学或华语及英语科学，让他们依课程需要，“偷”英语数理的一、两节课来赶华语数理的进度（访谈彭忠良，吉隆坡，2007年11月1日）。
- 20 Arumugam其时刚卸任“马来西亚淡米尔文教育研究与发展基金会”（Malaysian Tamil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undation）的秘书长一职。除教育外，他也是国内的人权运动活跃份子。Arumugam在访谈中并未掩饰他对董教总领导人当时较温和姿态的不满，认为他们不敢再如华教界前辈般，勇敢地向政府据理力争。事实上，两位我曾访谈过的基金会领导人（另一位是时任基金会执行总监的A.V. Kathaiah）并不讳言，该组织正是受董教总早年为母语教育奋斗的精

- 神感召，才效仿成立的。
- 21 该活动乃马华公会联手华总、商联会和七大乡团举办的“华社庆祝辉煌马来西亚”国庆文化大汇演。这场大型活动颇有为马华公会和国阵于2008大选前造势的意味，而选在当晚由开幕主宾阿都拉宣布这项决定，更明显有向华社邀功之意，即以此证明马华公会透过幕后协商，还是能有效促成对华社有利的政府决策。
 - 22 中六和大学预科班 (*matrikulasi*) 都是大学先修课程，不过中六的学程几近两年，大学预科班则只需要一年。又，马来西亚绝大多数的非土著学子只能循中六管道再经历高等教育文凭试 (*Sijil Tinggi Persekolahan Malaysia, STPM*) 的试炼后升读大学；土著学子大多则是经预科班的管道升读国内各公立大学。
 - 23 因大量吸纳马来雇员，马来西亚的公务员队伍庞大，就它与国内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实为亚洲数一数二者 (Gill 2005: 255)。
 - 24 私立大专院校多由私人财团筹办，以市场需求及盈利为导向，选择英语教学毫不令人意外。而学校若与国外大专合办双联课程，更是不得不如此。坚持以马来语教学为主的私立院校，为数甚寡。至于号称以华语教学为主体者，全国亦仅南方大学学院、新纪元学院、韩江学院及大同韩新传播学院（前为“韩江新闻传播学院”）四家。值得一提的是，这四家学院的不少商业、实务科系，尤其双联课程，其实仍采英语教学。
 - 25 东马在这方面的情况则相对复杂，政治裂隙主要是落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简略地说，马来人/穆斯林是族群政治上的当权者和既得利益者，华人、印度人、非穆斯林土著则基本上都是挑战既得利益者。所以就族群政治的观点而言，后者可视作同一阵营。
 - 26 相较而言，1989年时在华小就读的非华裔学生则只有17,309人，可见其变化。这方面由1989至1999年的完整数据，可参考（沈天奇 2006: 67）。不过1999年后，马来西亚教育部似乎就没再详尽公布过相关的统计数字。
 - 27 在西马和东马的某些偏远地区，因缺乏学校，当地的印裔或非马来裔土著的小孩不得不就读于邻近华小，故其家长之选择华小，或出于无奈，未必反映他们期待小孩将来能掌握华语的主观意愿。反观马来族群因一贯获得政府厚爱，国小林立，所以不就国小而主动送小孩入华小的马来家长，多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作出的抉择。
 - 28 马来西亚印裔人口的比例自独立迄今，都只在8~10%之间徘徊，远不及其他两大族群。又，其内多劳动阶级成员，社、经地位普遍较为低落，却又无法受惠于政府的土著扶助政策，故处境最糟，也最无政治影响力可言。
 - 29 前“马来西亚华人行业社团总会”会长刘盘石（1993~2007），也曾于2007年11月3日于吉隆坡受访时，提到过类似观察。
 - 30 譬如受访时甫卸任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主席的张志开，先是对马华公会与民政党等华人/华基执政党的领导人不能让华小免于实施数理英化政策而气愤难平，斥他们“没骨气”，但谈到中学阶段时，张氏则直言对华裔家长来说，能够由马来语

转为英语授课,那简直是“求之不得”。又,2009年7月执政者决定废止数理英化政策后,教专、国民型中学校长理事会、全国校长职工会等华文教育团体都公然表态,要求于中学阶段继续实施该政策。另外必须说明的是,因某些受访者要求匿名,文中所列并非相关受访者的完整名单。

参考文献

- 教总2007。《英语教数理可行吗?》。加影:马来西亚华校教师总会(教总)。
- 沈天奇2006。〈马来西亚教育统计数据系列〉。《马来西亚华文教育》5: 67-69。
- 吴珍妮、何华强、戴丽佳、王丽琴2013。〈英语教学吸引家长·私立小学渐受落〉。《星洲日报》国内版独家报导,2013年10月15日。
- 张荣强2008。〈英语教数理对华小学生的冲击〉。《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11: 59-76。
- ABDUL RAHIM Bakar & AWANG Sariyan (eds.) 2005. *Suara Pejuang Bahasa (The Voice of Malay Language Fighters)*. Kuala Lumpur: Persatuan Linguistik Malaysia.
- ABDULLAH Hassan 2005. "Language planning in Malaysia: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English Today*, 21(4): 3-12.
- _____(ed.) 2007. *Mengapa Kami Bantah! Penggunaan Bahasa Inggeris bagi Mengajar Sains dan Matematik (That's Why We Oppose the Use of English in Teaching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Kuala Lumpur: Persatuan Penterjemah Malaysia.
- ALIS Puteh 2006. *Language & Nation Building: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Medium Polic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ASMAH Haji Omar 1979. *Language Planning for Unity and Efficiency: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Status and Corpus Planning of Malaysia*. Kuala Lumpur: Penerbit Universiti Malaya.
- GILL, Saran Kaur 2002.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English Language Challenges for Malaysia*. Serdang, Malaysia: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Press.
- _____. 2005. "Language policy in Malaysia: Reversing direction". *Language Policy*, 4: 241-260.
- KUA, Kia Soong (ed.) 1990 (2nd edition). *Malaysian Cultural Policy and Democracy*. Kuala Lumpur: The Resource and Research Centre,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 LEE, Hock Guan 2007. "Ethnic politic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policy in Malaysia". In *Language, N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Lee Hock Guan & Leo Suryadinata, pp.118-149.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MAUZY, Diane K. 1985. "Language and language policy in Malaysia". In *Language Policy and National Unity*, edited by William R. Beer & James E. Jacob, pp.151-177. Totowa,

- New Jersey: Rowman & Allanheld.
- MEAD, Richard 1988. *Malaysia's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and the Legal System*.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 Studies.
- PENNYCOOK, Alastair 1994.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 PLM 2002 (2nd edition). *Keranda 152: Bahasa Kita, Air Mata dan Maruah Kita (Coffin 152: Our Language, Our Tears and Pride)*. Kuala Lumpur: Persatuan Linguistik Malaysia (PLM).
- PHILLIPSON, Robert 1992. *Linguistic Imperi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FF, Margaret 1967.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Malaya". *Asian Survey*, 7(5): 316-328.
- SHAHARIR Mohamad Zain 2005. "Beberapa akibat daripada pengajaran sains dan matematik dalam Bahasa Inggeris di Malaysia: Suatu penilaian empiris dan teori" (Several consequences from the teaching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in English in Malaysia: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and theory). In *Kertas Kerja untuk Kongres Pendidikan Melayu Ke-2 (Working Papers for the Second Malay Education Congress)*, edited by PBPPM, pp.17-50. Bandar Baru Bangi, Selangor: Persekutuan Badan Pendidikan dan Pembangunan Melayu (PBPPM).
- SHOHAMY, Elana 2006. *Language Policy: Hidden Agendas and New Approach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SPOLSKY, Bernard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N, Liok Ee 1997.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a, 1945-1961*.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